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与文化自信

张 静 李来容

摘要: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建设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时俱进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高度的文化自信,成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回顾考察这一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建设;文化自信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理性认识、自觉把握和充分认同,以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更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文化基础和先决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更广泛的、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①文化自信不会凭空产生,而是与国家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其形成轨迹汇入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

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②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文化发展的历程,清晰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渊源和发展脉络,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自信的政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肩负着推动文化建设繁荣发展的历史使命,在不断深化认识和具体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一

马克思认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收稿日期:2019-05-31

作者简介:张静,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李来容,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①具体就文化而言,“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注重从政治、经济与文化辩证统一的社会有机体内,认识和把握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性质、地位与功能。

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想,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关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及属性,毛泽东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建设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有着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③在文化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中,毛泽东尤为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党的文化或文艺工作是革命工作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④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发展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或理想信念,而是一个亟待实践的重大现实问题。毛泽东宣布“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⑤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新中国文化教育的性质“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⑥

1953年,党制定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与此相适应,文化工作主要是巩固新生政权和经济基础的改造,实现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改革旧文化,建设新文化。建立了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的各级文化管理机构,为文化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保障;对旧文艺、旧教育、旧语言等进行了有计划的改造,奠定了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初步基础。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加强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建设正反经验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和建设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毛泽东强调“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⑦他将文化建设的重心归结为人的思想观念的改造和提高,并对发展科学文化的指导方针及处理古今中外文化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9页。

③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95、698页。

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5-866页。

⑤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0-11页。

⑦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阐述,形成了继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之后的又一重要理论成果。他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①反省建国初期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倾向,指出对外国文化一概排斥或一切照抄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因而,“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唯有此才能“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②

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明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的双重需求下,党的八大明确了文化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对前期的文化思想也进行了全面总结。重申为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强调在处理古今中外文化关系的问题上,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同时,“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③这充分体现了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审慎态度,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党的八大精神指引下,我们党将文化事业的发展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格局之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④的目标。为统一党内外思想,他对“双百”方针推行以来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则做出了全面阐述,强调“双百”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一项基本而长期的政策。一方面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保证“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另一方面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又必须遵循鉴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应恪守“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⑤同时,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⑥的方针,高度概括了古今中外文化中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66年间,中国共产党继承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实践中形成了革命文化,展现了强大的文化优势,文化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一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自1950年底开始,《人民日报》相继发表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央组织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宣传普及工作,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热潮,同时对封

①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54页。

②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82-83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41、348页。

④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07页。此后,毛泽东又多次重申这一主张,如1959年12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详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⑤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29、234页。

⑥ 《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语》(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2页。

建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批判和清理,使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二是推动了文化事业的活跃与繁荣,涌现出大批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电影、歌剧、戏曲等多种体裁、富有民族风格和创新精神的优秀作品,开创了中国文艺的新时代。其中尤以反映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创作最为丰富,如《红岩》《保卫延安》《红旗谱》《东方红》《红色娘子军》《歌唱祖国》等,体现了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的导向,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在人民群众中反响巨大。三是通过学习雷锋、焦裕禄等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及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激发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铸造了全社会“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①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伴随国际形势的风云多变,党在文化探索中的指导思想呈现出正确与错误相互渗透与交织的两种趋向。由于社会主义文化是不同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的一种新文化,没有先例可循,又植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社会土壤,不能照搬外国,我们党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自身经验,借鉴外国模式,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探索。对此,毛泽东等领导人自始即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②但受国内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动荡及战争威胁、外交封锁的影响,党在处理阶级斗争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模速度上开始出现了严重失误。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文化领域“大跃进”等运动的接连发生,党的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等领导人推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初衷,以致“左”的错误愈演愈烈,文化的意识形态化走向极端,更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余年间,党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成就与教训客观上为新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与繁荣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但由于主观上还没有根本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问题,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际相结合,还需在新的探索中继续完成。

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现代化建设的转移,为文化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和文化建设的发展创新奠定了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和顺应新时期人民群众与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党的文化建设理论、方针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开启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历程。

随着思想解放和文化领域的日益活跃,极“左”思潮的禁锢首先被打破,文化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功能也逐步地被廓清与阐释。邓小平明确表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其“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③他对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做出了新的解释,即坚持“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

① 《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8页。

②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00、302页。

③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5页。

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其中的关键在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衙门作风必须抛弃”,“行政命令必须废止”。^①根据上述意见,《人民日报》于1980年7月26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简称“二为”方向),取代了建国初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成为新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引领了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激发了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一些西方腐朽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乘隙涌进,加之“文革”对社会道德风尚的严重损害,社会上出现了怀疑马克思主义、怀疑社会主义、怀疑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为了培育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文化,并为之提供必要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

为了保证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消除政治、思想上的不安定因素,邓小平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明确针对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叶剑英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表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②此后,邓小平重申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反映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体构想。

继此之后,党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涵。随着全党认识的不断深入,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现代化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与具体内涵。胡耀邦在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紧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十二大报告详尽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即包含“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其中文化建设是建设物质文明、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如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及多样化的群众性娱乐活动;思想建设则决定着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尤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社会主义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爱国主义等。^③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净化党风和社会风气,提升民众思想道德素质发挥了积极作用。1981年,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九单位联合倡议开展的“五讲四美”活动,即讲文明、

①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0-211页、第213页。

②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4页。

③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73-276页。

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涵形象化和生活化,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了更为贴切和直观的认识。

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和现状,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旨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并“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此后,党的十三大报告、十四大报告,都用了较多篇幅阐述精神文明建设。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讨论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今后十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中;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成为改革开放近20年来党的文化理论的集中体现。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产生冲击;国外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曲折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也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以思想道德建设为重点,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引导,而文化自身的建设凸显薄弱。为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正确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命题。

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论断,并初步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即“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②

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不断丰富。党的十五大提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同时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列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之中,凸显了文化建设的战略价值。江泽民在报告中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③他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基本内容、目标任务,并指出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在联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④

世纪之交,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文化领域各种思潮、流派泥沙俱下,良莠难辨,文化的

①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31、433页。

②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8、161页。

③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日),《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18页。

④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日),《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32-33页。

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要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①他认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且“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②这表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提出既显示了党的文化自觉,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展开和必然要求。此外,“和谐文化”的提出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更具实践性的体现。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又一次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间,我们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问题,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几代人不懈努力、接续完成并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体系,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成。这些文化建设理论成果的产生和发展,反映着党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继承、发展与创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文化自觉。

三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一方面,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预示着文化建设步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另一方面,国际竞争加剧,思想碰撞激烈,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频现,又显示出文化改革已至关键时期。在机遇与挑战共存的新形势下,如何接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其理论建构,是党在新阶段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③对于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过程和根本成就,习近平对此有精辟描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④此后,习近平又在以文艺、教育等为主题的多次讲话中,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全局,对文化问题做出了系列重要的论述,形成了完整的文化自信理论。^⑤党的十九大正式将“四个自信”写入党章,提出坚定文

①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二〇〇一年七月一日),《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277、276页。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24页。

④ 《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3年1月5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3页。

⑤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时代命题,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形势的准确把握。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2页。

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自信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文化自信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联系。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与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与自觉实践。“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习近平用“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生动叙说了近代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在艰难中不懈地寻梦、追梦、圆梦的历史进程。他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实践的发展走向,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更是文化自信的动力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党和国家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且强调“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②

第二,文化自信与“四个自信”的结合与统一。习近平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谱系,认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③他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④此后,习近平反复强调这一问题:2016年1月,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⑤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⑥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第一次将“四个自信”整体提出,表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⑦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大会上,指出“我们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是说就故步自封、不思进取了,我们必须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活力”。^⑧11月,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将文化自信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一个崭新高度,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⑨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四个自信”的相互关联进行了高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同时要求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41页。

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35-36页。

③ 《“改革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习近平总书记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人民日报》2014年3月13日,第1版。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9页。

⑤ 《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全方位外交的成功实践》,《人民日报》2016年1月5日,第1版。

⑥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9页。

⑦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⑧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1-52页。

⑨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

“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总之,“四个自信”是统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创新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

第三,文化自信的丰富内涵。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②这一论述从整个民族发展史的角度,分阶段总结了中华文化的重要成就,由此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是一个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整体。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血脉根基。中华文化是人类发展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中华民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灿烂文明,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无数优秀作品。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自强不息、不断壮大的重要根基,也是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源头。习近平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高度重视,形容其为中华民族的“根”“魂”“精神命脉”“坚实根基”“突出优势”“重要源泉”等,在历数了灿若星河的中华文化后,深深地感叹“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是如此强大、创造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③习近平还善于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如讲孝道、重民本、崇仁爱、尚节俭、守诚信、求大同及敬业乐群、扶正扬善、自强不息等。他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④

其次,革命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支撑。革命文化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近代新文化的光辉典范,扭转了中华民族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与发展方向,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和活力。革命文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也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习近平十分重视历史的教化功能,认为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位智者”,更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⑤他将历史比喻为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号召学习和研究党的革命历史,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奋斗的历史,以及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寻求民族复兴的苦难历程,从中深刻地理解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与重大现实意义。

再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当代体现,反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时代精神,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人类文化发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16-17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41页。

③ 《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50页。

④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第2版。

⑤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

展的进步潮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提升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更增强了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思想和新战略,形成了蕴含新文化理念和思维模式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习近平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①总之,文化自信在本质上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契合。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强国建设中的艰辛、气魄和智慧,体现着中华文化自我扬弃、创新发展的历程,也彰显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基因延续。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局势复杂多变,机遇与挑战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我们必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思想,把坚定文化自信落实到行动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共克时艰,砥砺前行!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Jing, Li Lairong

Abstract: Culture is the soul of a state and na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the requirement for establishing cultural confidence. Without high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there is going to be no great renaissa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paid high attention to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herited and innovated the classical culture of China, as well as promoted and developed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the advanced culture of socialism in th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led by the CCP. Furthermore,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lso undergoing change. Thus a high cultural confidence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become a huge spiritual forc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look back and examine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Keyword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pening and Reform;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Confidence

【责任编辑:张栋豪】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8页。